

学术专论

著书难为稻粱谋

——《论语正义》的刊行及所见清代士人生活

罗检秋

〔摘要〕 本文依据清代学者书札、日记等材料，钩稽了学术名著《论语正义》的刊行过程，肯定该书刊于光绪初年而非同治五年之说，且认为其延期梓行的主因并非“但求精校”，而是寻求刻书资金。《论语正义》的刊行反映了清代下层士人的生活情形，也体现了汉学家的学术理念和精神追求，而其丰富蕴涵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阐释和发扬。

〔关键词〕 《论语正义》 刘恭冕 学者交游 士人生活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6)-04-0090-13

道光五年(1825)，龚自珍写下耐人寻味的《咏史》诗，其中“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语尤受世人注目。^①该诗大体记录了清代“盛世”光环下的士人生活，反映出在文字狱钳制下，苟且偷安的士风。不过，清代士人治学情形不一，许多人依旧守望学术家园，不为或者难为稻粱谋。位处社会下层的宝应刘氏便是如此，其《论语正义》的刊行更值得再加考辨和认识。

一、刘氏《论语》学的历程

从明末到清初，宝应刘氏以理学传家，乾隆年间转治汉学，其中著名学者有刘台拱，字端临。18岁举于乡，留京授徒期间，得识天下名流，与高邮王念孙交往密切，长女嫁阮元的养子阮常生。刘台拱以读书、授徒为业，多次会试下第，大挑二等以教职用，久任丹徒县训导。他潜心于《三礼》研究，校勘经、子书，好签注经书，撰著《论语骈枝》等。“其考证名物，研精义理，未尝离而二之。传注有未确，虽自古经师相传之训诂，亦不为苟同，于汉、宋诸儒绝无依傍门户之见。”^②这些签注旁征博引，多有己见，甚至订正郑玄、孔安国的注释。嘉庆十年(1805)，刘台拱逝世时，所撰均为手稿。阮常生奉父命赴宝应奔丧，“并取其遗书《论语骈枝》、《荀子补注》、《汉书拾遗》几三卷”，由台拱之弟刘台斗(进士，官工部营缮司主事)及表弟朱彬编录，

〔收稿日期〕 2016-02-01

〔作者简介〕 罗检秋(196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100006；lluojq@163.com

① 《咏史》全文：“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② 朱彬：《刘端临行状》，《游道堂集》卷3，同治七年刊本，第21页。

经阮元审定付刊，此即曾经刊行的《端临先生遗书》。后来，刘台斗及台拱之子又补编其书。至道光十四年（1834），台拱的长女从家藏书篋中发现补编稿本，“泣授恩海，命付剞劂”，于是，刘台拱的外孙阮恩海重刊《刘端临先生遗书》八卷。^①显然，这些经学手稿的辑印得益于阮元和刘氏后人。

刘宝树、刘宝楠发展了《论语》研究。其父刘履恂与刘台拱为同祖兄弟，49岁才中江南乡试举人，博览经史，著《秋槎杂记》内外篇，考释儒经文字。刘履恂的继室乔氏，生于书香世家，严格督教宝楠、宝树兄弟，使之刻苦向学。同时，刘台拱“居乡里，不轻讲学”，惟接见宝楠及弟子苗某时，“辄娓娓不倦”^②。刘氏虽为旧族，但学无名师，主要是在家庭熏陶下潜心经史。

刘宝树中举后，多次会试落第。嘉庆末年大挑二等，任赣榆县儒学训导，随后补五河县教谕，不久以疾归。自其高曾祖以来，刘氏藏书已有百余年，各支分立后，“诸书亦随人迁徙”。刘宝树“贫未卖书。又常自警曰：祖遗者，如是而已。慎毋纵其朽蠹、不加拂拭。由是，每年六月，有晒书之役”。不幸，某年首夏，晒书失火，“万轴琳琅，付之一炬”。藏书多毁于火，刘宝树痛心疾首，“为文以悼之”^③。他一生默默无闻，任教谕之余，如同刘履恂、刘台拱一样，好读书，而不轻易著述。其《六十自寿》云：“半生羁旅半生愁，赢得漂零六十秋。过眼鸡虫争得失，几家弓冶续箕裘。怕吟《感遇》诗成讖，若复求官老亦羞。寄语吾家诸弟姪，旅筵觞咏自添筹。”^④该诗概述了作者漂泊困顿的一生，也寄望于弟侄们淡泊名利、接续家学。三年后，刘宝树自知不起，自订《娱景堂集》手稿三卷，卷上为《经义说略》，卷中为“杂著”，卷下为“诗钞”。《经义说略》涉及《五经》及《论语》、《孟子》，语多精粹。刘文淇说：宝树生前“绝口不谈经学；身没之后，余得读君遗集，乃知其于经史之学至为深邃”。“说经之文，不主故常，要能实事求是。”^⑤刘宝树不以经学名，遗稿也是由刘宝楠整理刊行。

嘉庆末年，刘宝楠在扬州设馆，与仪征刘文淇为至交好友，人称“扬州二刘”，同时被选为优贡生。后来刘宝楠中举人，并于道光二十年成进士，时年已50岁。随后授直隶文安知县，后又调元氏县。在任期间，询知民间疾苦，赈济灾民，勤勉清廉，被称为“循吏”，咸丰五年（1855）病卒于三河知县任。他于经学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嘉道之际专于疏释《论语》，说经兼采汉宋，而不乏经世关怀。晚年入仕而不废学，但因簿书繁琐，《论语正义》为未完之作。一般认为，刘宝楠注疏了《论语》前14篇共17卷，后6篇及《论语序》共7卷由其子刘恭冕续补，并修订全书。刘恭冕说：其祖刘履恂的《秋槎杂记》，叔祖刘台拱的《论语骈枝》、《经传小记》，伯父刘宝树的《经义说略》的相关见解都已融入《论语正义》中。^⑥

刘宝楠重视刻书，作县令时曾致函朋友：“春海先生《尚友录》，弟未见用，和诗已寄京否？竹云诗已刻未？吾郡文学王广陵在北宋乃卓然大家，乡人竟未有刻其集以传之者，阁下当力任之。”^⑦他著述丰富，而生前刊行者仅有《释谷》4卷以及所编《清芬集》10卷。自著诗文《念楼集》、考释经史的《愈愚录》、《汉石例》、《宝应图经》等都没有刊版，仅以稿本、钞本流传。有的至光绪年间已有刻本，《念楼集》则直到当代才有刊本。同光之际，有学者感慨“数十年

① 阮恩海：《刘端临先生遗书书后》，《刘氏遗书》卷末，光绪十五年广雅书局刊本，第3页。

② 《端临学案》，见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卷106，第3册，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年，第36页。

③ 刘宝树：《悼家藏书毁于火文》，《娱景堂集》卷中，《宝应刘氏集》，广陵书社，2006年，第76—77页。

④ 刘宝树：《六十自寿》，《娱景堂集》卷下，《宝应刘氏集》第99页。

⑤ 刘文淇：《娱景堂集叙》，《宝应刘氏集》第51页。

⑥ 刘恭冕：《论语正义·凡例》，《诸子集成》（1），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2页。

⑦ 刘宝楠：《刘宝楠致董诰》，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46—547页。

来，每以未睹其著作为憾”^①。刘氏以学术传家，而官职不过县令、教谕，且清廉自律。清中期，县令年俸多者 60 两，少者 45 两。为了维持生计，清廷允许州、县官从地方征收的溢额（附加费）中取支“养廉银”，主要用于办公开支、胥吏的工食银及幕友的薪酬，但大多数知县的养廉银每年在 500 两到 1200 两之间。“一个州县官的全部薪水几乎不够给幕友付酬”^②。教谕、训导为正、从八品，俸银仅 40 两，^③且无“养廉银”，不可能像封疆大吏那样刊行个人著述。事实上，举人以下的士子几乎都只能以设馆授徒、作幕宾或校书谋生。

刘恭冕（1824—1883），字叔俛，幼时受学于父，17 岁随父游宦，锐志读书，聆听教诲，陈质经义，不与闻政事，渐通小学和经学。刘宝楠卒后，《论语正义》遗稿未完。刘文淇致书恭冕云：“淇现为岑氏校刻《舆地纪胜》及朱武曹先生《礼记训纂》，均约于春夏间可以竣事。终日碌碌，未遑自理旧业。每念英俊勤于編集，深为健羨。《论语疏证》，尊甫已有长编，足下能继述盛业，不使高邮父子专美于前，是所望也。”^④高邮王氏为三代名宦，所著四部考证著作均在生前刊版，也令士人钦慕不已。在父执的鼓励下，刘恭冕继续研究《论语》。

咸丰六年，刘恭冕入安徽学政朱兰幕，承校李贻德的《春秋贾服注辑述》稿本。除校正文字外，还为该书“移补百数十事”，令朱兰叹服。其时，刘恭冕与刘文淇的独子刘毓崧切磋论学。恭冕致书云：“弟比以天热，校书所好轩，修篁翳日，颇娱清览。每得一疑谊，深苦识人不多，无从质难，今略具数事，为足下陈之。”^⑤恭冕提出请益的问题涉及《诗经》文字和对焦循解释的质疑。刘毓崧能传父学，专研《左传》而旁及诸子。“精于勘校，友人所述作或刊刻，多质君乃定”。“与朋友交，劝善惩过，终始不渝”。同治六年（1867）刘毓崧卒后，刘恭冕为撰墓志云：“恭冕与君世交垂四十年，平生所敬事如君者，曾不数人，而君今遽歿，悲夫！”^⑥其深厚友谊于此可见。

至同治五年，刘恭冕已基本续完《论语正义》，并注疏了《论语序》，修订全书。他于是年三月撰成《后叙》，并请父执陈立作序，同年冬又请冯志沂题签，^⑦下一步就是刊印行世了。同年三月，朱兰离学政任，迁内阁学士，不久即归田。刘恭冕一时无所归依，谋职无门。恰在此时，曾国藩创办金陵书局，继《船山遗书》之后续刊经史书籍。据张文虎日记，同治五年十一月底，由“朱久香（兰）学使荐刘叔俯入书局”^⑧。刘恭冕与已在书局的张文虎、刘毓崧及随后入局的戴望等人分校经、史书，他承校《后汉书》。

曾国藩开府江宁，宗宋学而兼采汉学，幕中吴廷栋、何慎修、涂宗瀛、杨德亨、方宗诚、陈艾等人宗宋学，而校书者张文虎、唐仁寿、戴望、刘恭冕、刘寿曾等人则治汉学，“所主既绝殊，攻攻互讥，犹凿枘之不入”^⑨。校刊经史是曾国藩重建儒学的举措。书局规模不过六七人，却时常得其垂顾。久在曾幕的朱孔彰（朱骏声之子）“落花碧草冶城东”诗注云：“公移书局于

① 匡源：《汉石例序》，参见刘文兴《刘楚桢先生年谱》，见《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广陵书社，2008 年，第 748 页。

②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等译校，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41—42 页。

③ 清代品官的俸银及非正式经费收支，详见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18 世纪中国合理化的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5—67 页。

④ 小泽文四郎：《刘孟瞻先生年谱》，见《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 679 页。

⑤ 刘恭冕：《与刘伯山书》，《广经室文钞》，《宝应刘氏集》第 586 页。

⑥ 刘恭冕：《清故优贡生刘君墓志铭》，《广经室文钞》，《宝应刘氏集》，第 590 页。

⑦ 冯志沂，道光进士，山西代县人，卒于同治六年（1867）四月。

⑧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五年十一月卅日），陈大康整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72 页。

⑨ 冯煦：《清故两淮盐运使洪公墓志铭并序》，《蒿庵续稿》卷 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 33 辑，第 328 册（4），（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 40—41 页。

治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① 曾氏的幕府和书局也大体成为江宁汉宋并存的象征。

校书者虽有学问，却是科场失意之士，功名多不过诸生。当时，科举之途对芸芸士子依然是狭窄而残酷的。刘恭冕最初与书局之外的张慎卿同住。同治六年秋闹时，张氏告诉张文虎等人，“头场病死试士数人，有一人以铜笔杵刺心而死，一人以刀剖腹死”^②。这则传闻未必完全属实，却不是空穴来风。科举对贫寒士子的压力在《儒林外史》等作品中已有淋漓尽致的记录。对于失意诸生，能入局校书不失为谋生良机。当时，江宁饱经太平天国兴亡的战火，满目疮痍，也透露出凄凉和阴森。江宁的老名士汪士铤在劫后惊魂未定，曾告诉刘恭冕等人，在金陵书局的旧屋里，“有人在楼上遇缢鬼几死”。但张文虎说，自己“居此屋二年余，未尝有鬼魅之说，恐属附会”^③。张文虎可以不信，而这些远离家乡的寒士仍不免忐忑不安。幸亏在曾国藩的关照下，金陵书局于同治六年三月迁入飞霞阁新屋，校书之事也顺利开展起来。

在书局数年，刘恭冕长期与戴望同屋而住，成为忘年学友。戴望（1837—1873），字子高，德清诸生，是曾氏得意门生俞樾的表侄。“少即不乐仕进，稍长，目微眚，性僻，益与世忤”。曾从宋翔凤治今文经学，援今文经学作《论语注》，“用宋先生及刘申受礼部说为多”^④。他认同魏源等今文家通经致用的路向，曾致书朋友云：“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弊而维圣道者将在于此。”^⑤ 这已表明其治学心志。戴望宗汉学，而反对汉宋调和。“性倨傲，门户之见持之甚力，论学有不合家法者，必反复辩难而后已，人故忌之。”^⑥ 后来刘师培云：湘军克复金陵后，“公卿咸慕儒术者，多伪托宋学以投时尚、博声誉。先生壮罹兵阨，客游江南，其所讲肆，多与世违。一时卿士大夫虽跻先生雅才之右，及论学辄牴牾不相合，而先生特立独行，竟以此不克申其志”^⑦。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金陵书局步履维艰。虽然曾、戴二人学术倾向不同、地位悬殊，但戴望此时如失林之鸟，致书张星鉴云：“因曾文正公之变，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中心郁悼，心火上炎，遂患喉病。频年境遇奇窘，又加以悼逝伤离，令人不堪回首，此多病之所由来……此间自曾侯薨逝，不堪依恋，将舍此他去，而资斧告匮，无以为计，不得已且作桑下之宿，然终非久策。”^⑧ 戴望还未来得及离开，便于同治十二年二月病卒于书局，年仅37岁。

刘恭冕在书局的另一好友是刘寿曾，字恭甫，刘毓崧之子。刘寿曾于同治、光绪间两中副榜举人。同治初年，刘毓崧即已入书局校书，为曾国藩器重，不幸于同治六年八月病卒。是年十二月，刘寿曾受曾国藩之招，入书局继续校书，“所校者多官书”。此外，又曾修《江都县志》，与汪士铤等纂修《江宁府志》。^⑨ 他“旁搜博览，见闻日扩”，“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但《左传》疏仍未撰成，且于光绪八年（1882）七月溘然而逝，年仅45岁，^⑩ 留下《传雅堂集》等手稿。

那些年，刘恭冕不像张文虎、戴望那样长住书局，多在农历腊月回宝应，正月以后才回局。

① 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光绪十三年初刊、1935年朱师辙补刊本，第41页。

②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八月十三日），第100页。

③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第113页。

④ 谭献：《亡友传》，《谭献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

⑤ 戴望：《戴望致张星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932页。

⑥ 张星鉴：《戴子高传》，《仰萧楼文集》，光绪六年刊本，第74页。

⑦ 刘师培：《戴望传》，《滴磨堂遗集》卷前，宣统三年刊本，第3页。

⑧ 戴望：《戴望致张星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933页。

⑨ 汪士铤：《墓志铭》，刘寿曾著《传雅堂集》卷前，1937年铅印本，第2页。

⑩ 刘恭冕：《刘君恭甫家传》，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75，《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99辑，第989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9页。

对于书局及江宁士大夫的茶话、雅集，刘恭冕也不像戴望、刘寿曾那样频繁出席。但对曾国藩的“招饮”，刘恭冕几乎没有缺席。他较之戴望、刘寿曾的幸运之处或许是择机离开了书局。同治六年，李鸿章转任湖广总督，但仍在军营“剿捻”。同治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张之洞任湖北学政，倡兴文教，在文昌书院之上创设经心书院，仿杭州诂经精舍，以经学造士。刘恭冕应李鸿章之请，于同治末年主讲经心书院，专课经训，以朴实学风训导诸生。

二、《论语正义》的刊行时间

1933年，刘恭冕的侄孙刘文兴提到《论语正义》的早期版本：恭冕于“同治丙寅告成，适应曾文正聘，校书金陵，遂以付刊，后取板置于家，孙某售之金陵书估。先是，王先谦刻《皇清经解续编》亦曾列入，故是书有二刻。又案：此书另有黄冈范氏重刻本，世不经见，孟徵先伯亦未言及，去岁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教授藤塚素轩先生来华，过访相告，始获知之”^①。

不过，刘文兴的说法仍待辨析。《皇清经解续编》始刻于光绪十二年，十四年刻竣，其中《论语正义》并非初刻本。黄冈范氏本也是在初刻本之后，据范氏跋云：刘恭冕主讲经心书院时，范华封“得交其嗣君子芳，悉先生之学。读所著《广经室文钞》，已非近世俳优轧苗之比。《正义》一书，同志尤争购之。原板为先生携归，华封乃出子芳向所持赠者，畀之梓民，用广其传焉”^②。可见，范氏刻本是在学者争购《论语正义》后重刊，而该书原板已为恭冕携归。

刘文兴说同治五年（丙寅）该书已经“付刊”。而且，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地藏有“同治丙寅冬代州冯志沂署检”的《论语正义》刊本。刘恭冕撰于同治五年三月的《论语正义》“后叙”云：该书到同治四年“之秋而后写定，述其义例，列于卷首。继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见书读之，冀少有裨益”^③。显然，该书“写定”之后，并没有立即刊行。

对此，台湾学者陈鸿森曾以陈立《论语正义序》、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陈澧《复刘叔俛书》、刘恭冕《刘君恭甫家传》等文献为据，认为刘恭冕在同治五年春撰成该书《后叙》后并未随即付印，仍续为搜讨。陈立卒于同治八年十二月，其序文说明《论语正义》彼时尚未刊版。陈澧《复刘叔俛书》也可见刘恭冕在同治年间仍在搜集最新成果。这些旁证了当时该书尚未刊印。且刘恭冕撰写《刘君恭甫家传》时云：“先君子所作疏已及大半，授冕续成之，光绪初梓行。”^④故陈鸿森认为，其刊行“实在光绪之初。此为当日相约著书诸君，最先梓行者”^⑤。

但陈鸿森的考证似乎未被研究者接受，其后一些出版物仍沿袭同治五年已有刻本。^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南京图书馆藏《论语正义》仍标明“清同治”刻本。^⑦近年的博士、硕士论文中，沿用旧说者不一而足，故对此有必要再加申述。如前所述，刘恭冕的《刘君恭甫家传》已提到“光绪初梓行”《论语正义》。如果作者回忆有误，则近年笔者所见其他材料也清楚地说明：《论语正义》印行于光绪初年而非同治年间。最新出版的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收录了刘恭冕致刘寿曾的六通书札，其二云：

① 刘文兴：《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述考》，《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735页。

② 刘文兴：《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述考》，《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737页。

③ 刘恭冕：《后叙》，《论语正义》，《诸子集成》（1），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435页。

④ 刘恭冕：《刘君恭甫家传》，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75，《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99辑，第989册，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0页。

⑤ 陈鸿森：《刘氏〈论语正义〉成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第506页，1994年。

⑥ 1990年以后，中华书局版《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一再印刷，流播很广，仍沿袭“清同治五年的初刻本”一说。

⑦ 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论语疏》未刻十一卷现已陆续谋付刊，计明岁当可毕工。从前奉赠数卷中有冕所评《论语》，乞即钞寄，将来仍须剞改，或抽换数叶方好。《春秋大义》凡例三则呈教……郭中丞侯新抚接印即南归，刘鹭汀先生亦欲归去，此间讲学之友无一人，只门下聪俊者尚可与言，冕劝其分经史习之，未知将来能有成就与否？陈卓人先生《白虎通》何时可刻竟？其遗稿曾付刊否？前所作《论语疏序》尾仍需增数语，文气方足，特另写一通，望阅后即交子绶兄，刻文时可照此本也……①

其三云：

八月间舍亲吴大琴轩回南京，属其带呈一信并《论疏》十二部托存书局代售，此信想早得达……此间明岁拟续纂通志（中丞昭勇决只，制军意不知若何），闻当事亦欲延吾兄分任斯事，到时当有书奉邀，弟及张联翁皆与此役也……有便人来楚，乞将《何休训》板寄来。《毛诗》、子高《论语注》刷价若干及《梅村先生集》价若干？统望示知，此间索此颇众。②

不难发现，刘恭冕的两封信写于经心书院授徒期间。前者提到托刘寿曾转交修改后的陈立《论语疏序》，后者托人带12部已刻成的《论疏》（《论语正义》）寄存在（金陵）书局。可见，该书在同治八年陈立逝世后，尚余11卷未刻，而在刘寿曾逝世之前已印行。

此外，孙诒让的刘寿曾墓表也明确提到：“同治中，诒让侍亲江宁，始得识恭甫。於时，大江南北方闻之士总萃於是，宝应刘君叔俛方继成其父楚桢先生《论语正义》，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为《义疏》，而恭甫治《左氏》为尤精……曾不数年，踪迹四散。诒让既南归，叔俛主讲鄂中，其书甫刻成而卒。”③所谓“甫刻成而卒”当是光绪初年，而至迟不会在光绪五年之后。光绪初年，刘恭冕就职湖北，逗留江宁的时间不多。孙诒让也不常住江宁，朋友们“踪迹四散”。孙诒让没有及时读到此书，印象中就成为“甫刻成而卒”了。孙诒让所撰刘寿曾墓表虽不完全准确（如刘寿曾、刘恭冕辞世次序），但关于《论语正义》印行于光绪初年的说法应无疑义。然而，该书刊行时，刘恭冕保留了“同治丙寅冬代州冯志沂署检”的题签，以至后来一些人视为同治刊本。

三、“但求精校”的限度

清人刻书周期不一，阮元的《皇清经解》、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工程浩大，都不过数年刊成。有些篇幅不大的个人著述很快便可刻竣，如乾隆年间，内阁中书赵怀玉曾写信给桂馥：“送刻拙诗，望即付梓，其款式并乞裁定。第一以速为贵，缘望日即有人南归也。”④显然，旬日之间赶刻诗集并不难。刊印学术著作稍慢，但像《论语正义》那样拖延十余年印行仍属事出有因。

其原因自然不排除寻求精校。刘恭冕与戴望、俞樾都治汉学，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论语正义》既引用俞樾的《群经平议》（初刊于同治六年）、《诸子平议》（刊于同治九年），又引

① 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二通），陈烈主编《小荪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03—805页。案，编者将此信排在刘恭冕六通书札之首，从内容来看，此信当排在第二。因排在第二者提到“陈卓人先生《论语疏序》尚未脱稿，请便中催之”（见同书第806页），可见写该信时陈立（字卓人，卒于同治八年）仍在世，应按时间排列第一。书札次序皆为笔者所加。

② 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三通），《小荪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807—809页。

③ 孙诒让：《刘恭甫墓表》，《籀廬述林》卷9，1916年刊本，第10—11页。

④ 赵怀玉：《赵怀玉致桂馥》，《小荪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上），第296页。

用了戴望的《论语注》（刊于同治十年）。该书前十七卷所引俞、戴二人的考释约有20余条，^①后七卷也引用了俞、戴之书若干条。这说明，刘恭冕“但求精校”一说并非毫无依据。不过，对此因素也不能夸大。从作者学术交往来看，其“求精校”的程度相当有限。

张文虎是金陵书局的老人，治汉学，精于校书。刘恭冕、戴望同时与之相识，交谊不相上下。同治五年底，刘、戴入书局后，刘即回宝应过年。戴望则与张文虎、李善兰、唐仁寿一起度岁，并将所撰《管子校正》手稿请张文虎指正。同治六年十一月，戴望又以所撰《论语注》书稿向张氏请教。张文虎对戴著并不完全赞同，认为《论语注》“多用《公羊春秋传》说，傅合处多矫强”^②。但戴望显然倚重张文虎。两年之后，张氏又记云：“自入冬来，戴子高以所辑《管子校正》属复校，然昼间校局中所刊书，不能兼及，只于灯下校阅，随笔记录，又得百余条，至此毕事。”^③刘恭冕对张文虎也是尊重的，如同治六年八月，赠所校李贻德的《春秋贾服注辑述》。张氏日记认为，该书“搜采颇博，辨证亦平允，末附诗词二卷”^④。翌年，刘恭冕又赠送已刊父著《释谷》。张氏认为该书“征引稍广，然拟似处不能确凿言之，注《雅》诚未易也”^⑤。而刘氏《论语正义》书稿始终没有请张文虎校阅。

戴望与刘恭冕的学术见解不同。戴望曾云：“叔俛兄经学虽有所得，唯惜其汉宋杂糅，与苏、常诸老派别实异，求如洵美、泳之之谨守家法，自二三君子外，不可多得也。”^⑥刘恭冕也不完全认同戴望的今文学路向，但对这位朋友还是相当重视的，且关心戴望遗著的出版。刘氏《何休注训论语述》除了多引刘逢禄、宋翔凤等人见解外，也直接引用了戴氏《论语注》，如“戴望注云：‘《传》曰：《春秋》系辞而不杀者，正也’”^⑦。戴望卒后，其家人也将一些藏书赠予恭冕等人。此外，刘恭冕的论学之友主要是俞樾、孙诒让。

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藩在江宁宴请俞樾、莫友芝、李善兰及书局的张文虎、刘毓崧、刘恭冕、唐仁寿等13人，^⑧这可能是俞樾、刘恭冕初识。俞樾是曾国藩器重的经学大家，名重士林。其后，刘、俞书疏往来。刘恭冕在较早时间读到俞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并在《论语正义》中有所引用。俞樾也读了《论语正义》的部分刻稿，曾于同治九年致书刘恭冕：“去岁承示《论语正义》一卷，受而读之，视邢《疏》详备，视皇《疏》谨严，真不朽之盛事矣。惟说‘萧墙’一事，引方氏观旭之说，与鄙见未惬。”^⑨事实上，俞樾仅校阅该书的极少篇章。

刘恭冕、孙诒让为忘年交，《论语正义》对汲取孙氏见解更为谨慎。孙诒让于同治六年中本省乡试举人。同治七年十一月，孙诒让应两江总督马新贻之请至江宁任道员，其后诒让侍父于江宁，与书局学者多有交往。孙氏后人孙延钊所撰《年谱》于同治九年条载：

诒让以南昌府本汉熹平《石经论语》碑末残字，校《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章》审定“盖肆乎”即“盍彻乎”之异文……举告刘叔俛，叔俛深以为然。盖宋元以来考释石经者，于此咸莫能详，叔俛遂疑其为逸文，非也……诒让读《论语正义》毕，凡为札记数十条。宝应刘宝楠撰《论语正义》，未成而歿，其子叔俛恭冕补成之，以刻本见寄，并属为审核。

① 见陈鸿森：《刘氏〈论语正义〉成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3分，第490—495页，1994年。

②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第114页。

③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第199页。

④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一日），第99页。

⑤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七年七月廿九日），第146页。

⑥ 戴望：《戴望致张星鉴》，《小荜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934页。

⑦ 刘恭冕：《何休注训论语述》，《丛书集成》续编第3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329页。

⑧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廿五日），第92页。

⑨ 俞樾：《致刘恭冕》，《俞樾函札辑证》（上），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

治让为举证二十余事，质之叔俛。此后续有发现，积有礼记五、六十条之多。^①

但《年谱》此处所载似不准确。孙治让在同治九年所读《论语正义》并非全书，其“举证二十余事”也可能晚于同治九年。现存孙治让致刘恭冕信云：

昨日下午辱惠顾，敬聆绪论，以前举质“哀公问有若章”汉石经异文，猥荷不弃刍蕘，以为致确，仰见虚衷下问之盛，曷任钦佩。迨来校读尊疏，又得剩义数事，谨再质之执事，未敢自以为是也……此皆琐屑义证，并附陈之以备财择。尊疏体大精思，远轶皇、邢。匆遽未遑尽读，俟更研绎，恍有所窥，当续录奉质也。惟鉴不宜。^②

上文省略处为孙治让所列8条考释《论语正义》的意见。这是现存刘、孙唯一谈及《论语正义》的书札。从中可见，孙治让校正《论语正义》不止一次。当治让发现《石经论语》“有若章”异文之后，曾写信告诉恭冕。恭冕以为然，并在其后“惠顾”晚辈学者孙治让，然后孙氏提出了8条意见。

关于刘、孙会晤的时间，据孙氏《年谱》载：同治七年冬，治让侍父江宁，得识在金陵书局的张文虎、戴望、刘毓崧、刘恭冕、唐仁寿诸先生。^③事实上，孙治让得识诸先生并非都在其父刚履任的同治七年冬，刘恭冕、孙治让晤面时间可能比较晚。同治九年二月，孙治让再来江宁。是年十二月及其后孙衣言在江宁邀请同人的多次雅集（孙治让多与会），均不见刘恭冕参与。为了与前辈学者刘恭冕交流学术，孙治让曾写信举告“哀公问有若章”的意见。至同治十一年，孙治让又以所撰《商周金识拾遗》初稿向刘恭冕请益，恭冕于是年十月为撰跋文，对其古文字考释给予高度评价。^④

大约同治十二年，刘恭冕“惠顾”了晚辈学者孙治让，并且以《论语正义》部分刻本请孙治让指正。孙治让还从刘恭冕那里“手录一副”刘宝楠读乾嘉诸儒《大戴礼记》校本的札记手稿。^⑤故孙治让后来说“同治癸酉，侍先太仆君在江宁……时相过从，商榷经义，偶出《大戴》校本示余，手录归之……今者甄录诸家旧校，亦以答刘君相示之意”^⑥。此后，孙治让写下了《与刘叔俛论论语义书》，且私下认为“楚桢先生《论语疏》，于古训亦详备，然援引似无限断”^⑦。其后，孙治让又提出了一些质疑。除考证文字之外，他对刘宝楠所引何休、刘逢禄之说不乏异议。比如：《论语正义》卷八注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云：“刘氏逢禄《述何篇》，此因上章而类记之”。孙治让认为，“《述何》义凿可删”^⑧。类似看法在他篇也有。不过，汲取今文家、宋学家的注解是《论语正义》的特色之一，刘恭冕的《论语正义补》相沿未变。孙治让对刘氏父子的《论语》研究陆续予以质疑、商榷，总计达数十条，而被采纳者不多，主因是刘恭冕格于观点和体例而不愿更改父著，故刘文兴说：

案，此孙仲容商榷之书。是时《正义》已定稿，不独前十七卷未用其说，即后七卷为叔俛公所述，于“朱紫”之辨，亦止采江说也。又向于故纸中得叔俛伯祖所著《论语正义补》一卷，前有王蒿隐颂蔚先生《序》，所述“德不孤，必有邻”，即取仲容书中之说，然“传不习乎”，“传”读“专”，“德不孤，必有邻”，“邻”训“报”，则皆楚桢公所已采，而又自以为“不敢定于一是者”……叔俛伯祖《凡例》亦言“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以正向来墨守之失”，是公父子书例如是，非以创解为定论。及作《补编》，自变其

① 孙延钊：《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② 孙治让：《与刘叔俛论论语义书》，《籀庠述林》卷10，第18—22页。

③ 孙延钊：《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

④ 孙延钊：《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第105页。

⑤ 孙延钊：《孙衣言孙治让父子年谱》第117页。

⑥ 孙治让：《大戴礼记校补叙》，《籀庠述林》卷4，第19—20页。

⑦ 孙治让：《孙治让致刘寿曾》，《小荊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983页。

⑧ 孙治让：《籀庠读书录》，《籀庠遗著辑存》，中华书局，2010年，第242页。

例，而不以入《正义》，盖始终不以己意杂入也……又以见叔俛伯祖编辑之慎，不苟同也。^①

总之，《论语正义》在刻印过程中，吸取了俞樾、戴望等已刊新著的见解，对已刻部分有“剗改”，甚至“抽换数叶”的情形。但总共汲取他人的意见不多，且文字简练。对孙诒让的意见，《论语正义》基本未予汲取，而刘恭冕自著《论语正义补》收入了若干条。因此，刘恭冕因寻求精校而推迟刊印的意图并不明显，更重要的或许是因客观困难而拖延下来。

四、刊印途径和资金

事实上，同治五年（1866）以后，刘恭冕一方面力求精校，搜求遗漏书籍；另一方面则在寻找刻书经费。笔者认为，主要因为后者，该书拖延多年才全部刊出。

刘文兴说，刘恭冕“应曾文正聘，校书金陵，遂以付刊，后取板置于家，孙某售之金陵书估”。^②据此，该书似乎列入了金陵书局的刻书计划，但未能实行。刘文兴此说只是笼统之词，还有待辨析。刘恭冕的从弟刘岳云说：恭冕“与人交，一以诚，未尝脂韦圆转，虽间为宵人所卖，处之泊然，繁古之经师，德与学称者也”。^③这番评论或许也包括《论语正义》梓行之事。不过，以金陵书局情况及刘恭冕的地位而论，书局恐怕不会有刊印此书的计划。

曾国藩自咸丰末年被授钦差大臣、总督两江，而驻江宁时间不长。同治元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已在安庆着手刊刻《船山遗书》，张文虎、刘毓松等分任校讎，于四年十月刻竣。同治四年五月，曾国藩已离两江总督任，奉旨北上“剿捻”，李鸿章继任。同治六年二月，曾国藩再督两江，亲定书局章程，一年后又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主张既刊印经史名著，又兼刻清代汉学家的著述。同治六年，他提出将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钱大昭的《两汉书辨疑》考证前后《汉书》的条目附刊，还主张以聚珍版刊印顾炎武的《肇域志》。^④这一计划得到刘恭冕的支持，4个月之后，汪士铎拟定了《校编〈肇域志〉条例》。张文虎认为，此事盖恭冕之意，然戴望“殊不愿也”^⑤。鉴于刊印正史已有进展，曾国藩于同治八年七月又致信书局，“命校刊王石曜《读书杂志》”^⑥。曾国藩推重的是王夫之、顾炎武、王念孙等名家著述。

继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于同治七年九月履任。此时，张文虎、刘恭冕、刘寿曾等人已基本校完前四史，于是年十月去拜见新任总督。马新贻对刊印清人著述兴趣不大。张文虎日记云：“制军欲令刻廿四史，其意甚好，然工程太巨，且非三四年所能集也。”^⑦尽管校书者看法不同，但金陵书局于次年完全改为官办，重刻二十四史的工程随之蓬勃开展，实际上由金陵、湖北、苏州、浙江等官书局合刊。俞樾在浙江收到马新贻寄赠的《汉书》后，特致信云：“刻史之举，金陵书局直任至《隋书》而止……计《旧唐书》以下，尚余九种，雨生中丞允刻《辽》、《金》、《明史》，则又去其三矣。见在与筱翁议定，浙江刻新、旧《唐书》及《宋史》，而以薛、欧《五代史》

① 刘文兴：《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述考》，《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742页。

② 刘文兴：《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述考》，《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735页。

③ 刘岳云：《族兄叔俛事略》，《宝应刘氏集》第594页。

④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第113页。

⑤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七年三月十七日），第113页。

⑥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八年六月四日），第183页。邓文锋编“金陵书局刊书目录”，包括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张文虎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刘毓松的《王船山先生年谱》及张尔歧、朱轼、曾国藩等清人著述，没有顾炎武的《肇域志》，可见该书未刊行。该“目录”罗列较详，但文字有误，如《史姓韵编》作者显然是汪辉祖，而非“汪祖”；《浪语集》作者薛季宣是南宋人，而非清朝人。见其《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148—151页。

⑦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七年十月二日），第156—157页。

及《元史》请合肥相国于湖北刻之，三四年间，全史可毕工，伟然大观矣！”^①直到同治九年马新贻被张汶祥刺杀于总督任，这项工程一直在紧张进行。金陵书局如此繁忙，刊刻个人新著显然不易。《论语正义》没能列入书局计划也就不奇怪了。

刘恭冕及朋友的书信多次提到寄《论语正义》至金陵书局。光绪初年，程秉钊在江西书局任职，主修《江西通志》，曾写信给金陵书局的刘寿曾：“戴君集因刻《邹叔绩遗书》（邹氏于学无所不通，湘中奇士也），久未印刷，邹书因志事旁午，仅刊及半，其余无暇校刊，遂至停工……十月中得令弟及叔俛先生书，知有见寄《论语正义》在尊处，此书恐信局邮寄不便。当先修函答谢，再从叔假观，亦可先睹为快，似可遇便再求转寄耳。”“此后故书秘籍俱可广为搜刻，以彰同文之盛，不似江右书局以惜费停刊，仅作货书肆也”^②。从信可知，刘恭冕赠给程秉钊的《论语正义》已寄往金陵书局。程氏修书致谢，并云可先从赵之谦（叔）处借阅，告知刘寿曾不必从信局邮寄。显然，邹汉勋、戴望的书均列入了江西书局的刊刻计划，却“以惜费停刊”。这类情形在当时大概不一而足。

刘恭冕提到了《论语正义》的刻印办法和资金来源：“陈卓人先生《公羊疏》已成不刻，令人闷绝。昨与一友人言之，可以助刻，然必从自家忙起，先刻一二卷，再去找人。如《论语疏》之得刻成，即此出也。”^③可见，刊行《论语正义》的办法是自己“先刻一二卷，再去找人”，由朋友或书商资助刻成。他认为此法行之有效，陈立的《公羊疏》也可仿行。然而，这种办法并不简单易行。

校书者学有专长，但无科举功名，不在品官之列，其地位、薪水不及县令和教谕。金陵书局的校书者月薪仅20多两纹银。^④张文虎的资历、学识在书局名列前茅，却于同治六年底感慨：“衰年远客，为贫所使，往返千里，音问都难。使故乡有五十千文馆，决计归峪，亦不恋此非幕非官之一席矣。”^⑤校书者待遇不及幕宾，甚至不如设馆授徒，而且薪水并非固定。按例，书局提调在农历元宵节后宴请校书学者。马新贻任总督后，负责局事的提调周学浚去职，江宁知府涂宗瀛接任。涂氏学宗宋儒，与书局学者本非同道。同治八年正月十八日涂氏宴请，仅张文虎、唐仁寿、刘寿曾到场，戴望“患病”，刘恭冕等几人“俱假不归”。而“局中刊书计字算帐，向由提调批发，至江宁府署领钱，去年夏工头李姓以已算之卷濫领，冒支至三百余千”。因此，张文虎向涂氏建议，以后“刻局收照以钤记为凭，设立号簿骑缝存根，满月缴销勘验”^⑥。校书者的薪酬大致可养家糊口，却无力刊刻篇幅较多的著述。《船山遗书》320余卷，据说耗白银数万两（其中曾国藩捐廉俸三万两，曾国荃捐八千两）^⑦。《论语正义》24卷，估计费用也得千两左右。以刘恭冕的家境和地位，先刻部分书稿并不容易。

自己刻成一二卷之后，找人助刊更难。清中期，图书销售不易。乾隆进士、擅长诗辞和戏曲

① 俞樾：《致马新贻》，《俞樾函札辑证》（上），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14—215页。

② 程秉钊：《程秉钊致刘寿曾》，《小荪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1031—1034页。

③ 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五通），《小荪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812页。

④ 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十一月《复钱振伦》云：“令弟之事，鄙意久定，因托者颇多，故月初始行定局。书局月俸虽仅二十四金，而职事较简，与令弟不愿远出不耐过劳之指相符。”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书信之九），第30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

⑤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一日），第111页。

⑥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八日），第169页。

⑦ 编辑《船山遗书》的欧阳兆熊说：该书在咸丰四年毁于火后，“友人赵惠甫刺史言于沅圃宫保，遂付八千金嘱予重刊，自百五十卷增益至三百卷”（欧阳兆熊：《书王船山先生轶事》，《水窗春吃》卷上，中华书局，1984年，第8页）。又，朱孔彰有诗云：“劫历红羊失五车，浓香斑马选梨初。欲将节义风天下，先刻船山百卷书。”注云：“公（曾国藩）捐廉俸三万金，设书局，重刊经史。先在安庆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见朱孔彰《题江南曾文正公祠百咏》，光绪十三年初刊、1935年朱师辙补刊本，第41页。

的李调元曾编印《函海》丛书，收录历代及自撰经史、文学作品 30 种，托王芑孙销售，却无人问津。王芑孙致信云：“前吾兄所留《函海》一部，以价稍贵，无人销售，今留弟处矣。外附区区十六金，以当书价可也，以为故人春驿梅花之寄可也。伏唯莞纳。”^① 刘文淇曾购得《资治通鉴》，觉得“颇可观览”，“其价银十六两”^②。金陵书局刊刻的《史记》、《汉书》等，售价为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张文虎在同治七年记云：刘逢禄的《刘礼部集》，以前在京城琉璃厂仅售五百文，“今从京中寄买来，价银二两，悬殊数倍，盖近日京钱十千兑银一两也”^③。绩溪胡氏以礼学传家，胡培塈的《仪礼正义》40 卷久负盛名。光绪初年，胡培系曾致信刘寿曾，请代留意销售该书：“前岁印有《仪礼正义》寄售（每部四洋。此书现存军需局周质庵亲处），以为重刻《文钞》之资，贵交游中如有需此者，并乞留意是荷。”^④ 以胡氏的学术声誉，《仪礼正义》仅售四元，却销路不畅。一般学术图书印数有限，难以获利。道咸年间，邓显鹤编纂图书颇有时誉，其《资江耆旧集》仅“印得百五十部”^⑤。刊印尚无影响的学术著作显然更难。《论语正义》非士人必读之书，且时人褒贬不一。该书即使印行，售价当在十元以下，印数也不多，自然无利可图。正是在此困局中，《论语正义》的刊行久拖不定。

同治末年，刘恭冕赴武昌经心书院授徒，其后还担任湖北志局的编辑，主持修撰了《沔阳州志》、《黄州府志》、《汉阳府志》、《黄冈县志》。正如章学诚等失意士人一样，修志是增加收入的机会。刘恭冕在鄂致信刘寿曾，告知王芑卿分纂“湖北通志”的“晷度輿图、沿革图、关雒三门，大约可得五、六百金而已”^⑥。刘恭冕的修志薪酬当与王氏不相上下。在那里，刘恭冕还想利用湖北官书局的关系，设法为朋友寻找刊书机会。他致信刘寿曾：“仲虞先生《周易》，粮道张鹿仙先生（书局副办）已经允刻，为胡月樵先生（书局正办）所阻，不知何故？湖南友人张君升香（名维馨，亦在书局），言其同乡治汉学者甚多，此书必可集资刻之，姑缓须臾，即知其行止，如更无望，即寄还。”^⑦ 胡月樵即主持湖北崇文书局的胡凤丹。至于此公主张，刘恭冕后来信札云：“此间书局总办胡公，喜刻坊间通行之书，易于销售，凡通儒著述，皆不欲刻，其性然也。”^⑧ 因此，刘恭冕帮助朋友刊刻著作的努力无果而终。

刘恭冕的另一信札也说明，《论语正义》不是由官书局，而是由私人刻印。他告知刘寿曾：“又卓翁《公羊疏》，弟曾与王芑卿（颂蔚）庶常言之，芑翁现馆总署，言中丞可函致左相或苏抚，可由官局代刻，此皆极难得机会，不可错过。可函告之子绶，能携稿来楚一走否？万一有成（潘先生《论语集笺》即是官局代刻），岂非吾党中争一大体面，而子绶孝思亦见用慰。书至此，真乃欢喜无量矣！”^⑨ “潘先生《论语集笺》”即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光绪七年（1881）江苏书局初版。此时，《论语正义》已经刊行，却不如官局刊行“体面”，故他以潘维城为例，推动陈立的遗著出版。陈立的《公羊义疏》后来收入到《皇清经解续编》才刊行。

总之，《论语正义》的刊印过程大致是，刘恭冕在江苏做了部分刻版，同治末年带至武昌。他得到刻书资助后，或许还有自己修志的部分薪酬，最后由私人或书商刻完。刘文兴说，“《正义》一书，同志尤争购之。原板为先生携归，（范）华封乃出子芳向所持赠者，畀之梓民，用广

① 王芑孙：《王芑孙致李鼎元》，《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上），第 350 页。

② 刘文淇：《刘文淇致丁晏》，《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中），第 582—583 页。

③ 张文虎：《张文虎日记》（同治七年八月十六日），第 151 页。

④ 胡培系：《胡培系致刘寿曾》，《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 774 页。

⑤ 邓显鹤：《邓显鹤致黄本骥》，《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中），第 486 页。

⑥ 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六通），《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 815 页。

⑦ 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二通），《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 804 页。

⑧ 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四通），《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 810 页。

⑨ 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三通），《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第 808—809 页。

其传焉”^①。黄冈范氏重刻本，不是使用原板。但原板曾经留在武昌，不然何来刘恭冕“先生携归”之说？因《论语正义》在鄂刻印成书，刘恭冕才托回江苏的亲友带回12部，请刘寿曾代售、代赠。《论语正义》不是由官书局，而是由私人刊印，不署出版者也就理所当然了。《论语正义》印行后，受到读者欢迎，故有黄冈范氏重刻本及其他版本。

光绪五年，56岁的刘恭冕中乡试举人，再无入仕机会。晚年主讲席，“诱掖后进，惟恐不及，凡与游者，虚往实归，莫不欢洽”^②。又拟撰《古文通假释》，未成书。光绪九年六月，因中风卒于家。

五、士人著述面面观

道光进士、曾署镇江知府的许槌云：“刻书有三乐：终年讎校，孜孜不倦，可以收束身心，一乐也；嫜嬛秘籍，传之人间，有裨来学，二乐也；日积月累，版片既多，子孙得以坐享羨余，较诸良田，尤无歉缺，三乐也。”^③士人以刻书为乐，但享此境界恐非易事。他们入仕、授徒或游幕之余，沉潜于考经证史，许多学术专著经过作者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得完稿。刘氏学者注重学术，而著述几乎均未在生前刊行，《论语正义》也是几经曲折才得刊版。总的来看，清代士人学求实证，著书不易，出书也无利可图，可谓“著书难为稻粱谋”。

清代中下层学者的处境大多如此。惠氏弟子江声享誉学界，嘉庆初年举孝廉方正，赐六品顶戴，但生活贫寒。宦宦学者孙星衍曾寄银数十两接济，江声谢云：“接奉手函及《明堂考》，且奉厚惠千金，窃念阁下爱我，谢非笔所能罄也。计阁下贻我，于今四次矣。去年曾致书阁下勿复见赐，不至伤惠，俾声亦不至伤廉。譬犹处涸辙之中，蒙被雨泽，焉能不接受，然心实歉仄，感愧交并也……自计昔为刻书受钱颇多，方患实不副名，前此既不可追，后此宜深自厉，见利辄取，毋乃累乎？”^④江声的刻书、生活处境在信中已有清晰体现。又如，乾隆十九年进士周春，官广西岑溪知县，博学好古，精于音韵学，著述多种。他致朋友信云：“拙著《杜诗双叠谱》，秦小岍观察为作序，现同抱经先生序一并付梓……弟《十三经音略》等书无力开雕，终归覆酱。意欲将与钱文敏公、抱经先生论音韵书两通附刻《杜谱》后，庶留一生韵学之苦心耳。”^⑤乾嘉年间，汉学如日中天，江声、周春等闻名士林，其著述尚且如此，何况许多默默无闻者！

经史著作如此，文学作品也未必乐观。道光年间，邓显鹤所编《资江耆旧集》是在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下才得以刊版。故邓氏云：“昔裕之辑《中州集》，历二十寒暑，仅成卷帙，无力刊行，后得赵提学国宝资藉始侵木。时以谓非裕之搜访百至，则无以启词人将坠之业；非赵侯好古博雅，则无以慰士子愿见之心。盖成书之难如此。今是集定议初及竣事之后，皆尚书始终主之。余不敏，特效钞胥之役云。”^⑥该集虽得刊行，而印数仅150部。

考经证史耗费心力，出版又不易，许多汉学家实际上一生贫病交加，默默无闻。如与刘恭冕相类似的张星鉴，字伟余，与戴望、陈倬等师从陈奂，屡应秋闱不中，以诸生终。张氏以游幕为生，历皖鄂豫等省，与咸同年间校书者多有交往，曾撰《国朝经学名儒记》一卷，专记汉学家的里居、仕宦及撰述之目，比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收录人物更多而较简略。是书得河南学政之助刊行，其余则难以面世。同治年间，张星鉴曾去金陵书局拜访戴望、刘恭冕，于治学之

① 刘文兴：《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述考》，《扬州学派年谱合刊》下册，第737页。

② 刘岳云：《族兄叔俛事略》，《宝应刘氏集》第594页。

③ 许槌：《许槌致蒋光焄》，《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中），第575页。

④ 江声：《江声致孙星衍》，《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上），第113页。

⑤ 周春：《周春致吴騫》，《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上），第162页。

⑥ 邓显鹤：《资旧耆旧集序》，《南村草堂文钞》卷三，咸丰元年刊本，第2页。

艰辛颇有同感。自记云：“时局中刻诸史，任校讎之役者如德清戴君子高，宝应刘君叔甫，各以文章、学术雄视一时。子高好读毗陵庄侍郎、刘礼部书，为先汉今文家学。叔甫系端临先生从孙，考证经史，能不坠其家法。与之言论，慨异学之鼓簧，叹经生之不遇。”^① 陈倬云：张星鉴“学守师承，说经一以汉儒为法”。“晚年学益邃，未尝一日稍得志”。光绪三年（1877），“倦游返吴，老而贫，贫而病，里居困瘁……有子先卒，身后萧然，家徒壁立。亲友为营丧葬事既毕，其戚朱砚生给谏……搜访遗文，将以付梓，得《仰萧楼手稿》二卷”^②。清代汉学兴盛，晚清犹有遗风。但对朝廷来说，经学的重要性显然不如汉代，其价值始终体现在工具层面。故有清一代，经师有不遇之叹者绝非少数。刘恭冕虽于逝世前得中举人，却没有入仕，一生境遇并不比戴望、张星鉴优裕多少。这当是清代中下层士人的普遍情形。

六、结语

综上所述，《论语正义》虽为清代经学名著，而刊刻面世却颇费周折。其延期梓行不仅是为了修饰、精校，而且因受刊书条件的限制。这种曲折与清代一般学者的生活状况是完全吻合的。清代汉学家的不少著作都是历经几代人才得以完成、刊行的。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沉潜于考经证史，不计功利，锲而不舍。清代学者著述之勤奋，实证学风之浓厚，诚为史所罕见。《皇清经解》及《续编》收刊者还只是清人著述的小部分，数量更多的史学、诸子学著述和个人文集，多没有在作者生前刊行，也难为世人注意。

进而言之，清代士人尽管不乏趋炎附势、贪图利禄之徒，而大量学者却受儒学浸染，酷嗜传统典籍，以学术收获为根本目的。研经考史既是其职业需要，又是其精神生活的必备内容。在高压政治下，他们确实畏闻文字狱，而著书为稻粱谋者则在主观上或客观上均非主流。笔者以为，撇开某些外在环境不说，正是士人置重学术的精神追求造就了清代汉学的辉煌，而其丰富蕴涵还有待于今人进一步认识、阐释和发扬。

References

- Chen Hongsen. "A Survey of Publishing Process of Lunyu Zhengy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65, no. 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1994.
- Chen Lie, ed. *Collected Letters of Ch'ing Scholars in Little Mangcang Studio*. revised.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 Deng Wenfeng, *The Official Printing Bureau in Late Qing Dynasty*, Beijing: China Guji Press, 2011.
- Madeleine Zelin. *The Magistrate's Tael: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 trans. by Dong Jianzho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ung-tsu Ch'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trans. by Fan Zhongxin et al. Law Press, 2003.

Scholarly Writing is not for Living: Qing Literati's Life Reflected in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Lunyu Zhengyi*

LUO Jianqi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luojq@163.co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Lunyu Zhengyi*, based on Qing literati's correspondences, journals, and etc. It asserts that this book was printed in the early Guangxu reign instead of 1866 (the fifth year of Tongzhi reign). It argues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layed production was not to seek further accuracy of collation but due to short of funds for printing.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the book mirrored ordinary literati's life in the Qing Period, and also embodied the Han Learning Scholars' academic pursuit. It deserv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① 张星鉴：《赠丁咏之序》，《仰萧楼文集》第20页。

② 陈倬：《仰萧楼文集序》，《仰萧楼文集》卷前，光绪六年刊本，第1页。